

雙向合流：2021 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 *

趙哲

[摘要] 2021 年有關澳門文學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一年來，澳門文學不僅以獨特的風姿和紐帶性的作用積極融入大灣區文學共同體，驅動力更加精準，研究視野也更為清晰；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澳門文學正在努力構建在地感極強的研究圖景，在創作和研究方面各有收穫。從澳門文學現代性的發生、歷史沿革到各文體的發展狀況，研究的深度逐步推進，在構建本土化研究系統的同時，同步面向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融入，總體上呈現出雙向發力的趨勢。

[關鍵詞] 文學 大灣區 本土性 澳門

一、大灣區文學視野中的澳門文學

澳門文學近來在大灣區文學共同體構建的過程中逐漸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和價值，澳門文學的研究史也逐漸進入了學界視野。隨着大灣區文學後續發展的方向，澳門文學的發展也有了更加明確的任務。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一項重要的文學活動是 2021 年 10 月 23 日在廣東省作家協會嶺南文學空間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一周年座談會暨廣東文學評論年會。會上，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吳義勤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編委的身份指出，面向粵港澳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在廣東熱烈的文學氛圍中，這一年來逐漸形成了越來越清晰的風格和定位，社會反響也越來越大，這些都為刊物今後行穩致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對於刊物今後的發展方向和工作任務，他還提出了要將香港文學的經典化和澳門文學的經典化工作提上日程，完成大灣區文學歷史感與現場感的有機結合，在形成鮮明的文風和立場的基礎上，以刊物欄目和話題設置帶動文學活躍度，在跨界意識和大文學意識開闊包容的視野中，^①組建和培養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家隊伍，力求大灣區可以成為今後向全國輸送評論家的一方陣地。^②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當代香港文學跨界現象研究”（編號 20FZWB063）、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媒介融合與當代江蘇文學跨界互動研究”（編號 2020OJSA1089）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趙哲，徐州工程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徐州 221006

^①“大文學”思想是對文學特質和文化建設進行深入思考的結晶。詳細參見張毅：〈從“純文學”觀念到“大文學”思想——兼談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古今會通〉，《文學與文化》（天津），第 1 期（2020），頁 15。

^②王金芝：〈《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一周年座談會暨廣東文學評論年會專家發言摘要〉，《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第 6 期（2021），頁 153—158。

由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立，2021年的澳門文學研究也隨着大灣區文學的整體發展時常被學界的視點所觀照，例如山東大學黃萬華教授提出的香港、澳門文學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背景下的“前存在”。在〈“前存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背景下的香港澳門文學〉一文中，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作為三地文學發展歷程的一種結果，其中的“前存在”至關重要，^①即三地當代文學七十年歷史所積累的“本土性”、“開放性”和“關聯性”。該文以報刊為重點的考察視角，對置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背景之中的香港和澳門兩地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爬梳，集中分析了香港文學和澳門文學如何透過報刊媒介，在進入文學歷史現場的“物”、“人”、“事”三個維度上——文本場所（書籍與報刊）、文學作品所面向的主體和受體（作者與讀者），以及文學現象與事件，完成粵港澳大灣區特殊的文學場域的建構，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粵港澳文學構建了“遠超”該地域文化空間的“中華民族文化體”。這樣的觀點不僅肯定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歷史意義，還指出了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灣區文學帶來的民族文化意義。

又如中國傳媒大學樂琦教授等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歷史源流及傳承述評〉一文，文章從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學淵源入手，以述評的方式對廣東、香港和澳門三地分別進行了文學歷程的溯源，雖然三地之間文學與文化內在的千絲萬縷關聯並沒有在文章中呈現，但作者提及的晚清嶺南文學、香港學海書樓等重要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場所，卻是我們進入大灣區文學史現場的重要憑據。^②文章對澳門文學史進程的基本脈絡作出了鳥瞰式的宏觀梳理，從澳門進入文學視野的起點——湯顯祖與賈梅士開始，延續這一條線索指出了澳門葡語文學與澳門土生文學的起始，以及“澳門作家”的界定問題，並從李觀鼎等的《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2009）、鄭煒明《澳門文學史》（2012）、李淑儀的博士論文〈十六至二十世紀澳門葡語文學的探索與研究〉（2000）、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相關論述以及張劍樞對澳門文學意義的發掘等重要的文獻，結合回歸後澳門文學發展的成就，例如作家出版社與澳門基金會、中華文學基金會共同出版的澳門文學系列叢書等，列舉出了有關澳門文學重要的研究成果。儘管一些重要的專著未被文章提及，像張堂錡《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2018）、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2018）和朱壽桐主編的《澳門文學編年史》（2019）等，但作者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視野盡力向我們展示出澳門文學研究史的發展圖景，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二、澳門新文學的發生及澳門文學史沿革

澳門現代文學的發生或成為2021年度的熱點話題，學者們紛紛對此提出重要的觀點。而新史料的發現也刷新了以往學界對澳門現代文學的發生和20世紀30、40年代澳門文學生

^①黃萬華：〈“前存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背景下的香港澳門文學〉，《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第5期（2021），頁5。

^②樂琦、范伊夫：〈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歷史源流及傳承述評〉，《粵海風》（廣州），第1期（2022），頁9—12。

態的認識。如廣東海洋大學學者李明剛詳細闡述了澳門本土刊物《醒心周報》等新史料的價值，^①通過梳理在其中發表的白話文各文體作品，瞭解這一時期澳門新文學初步向現實主義靠攏的基本樣貌。值得注意的是，文藝色彩頗為濃厚的創作及編輯風格卻偏偏寄生於這樣一本本土宗教刊物上，由此折射出彼時作為殖民地的澳門在新文學發展歷程中的曲折境遇。作者指出，《醒心周報》從第三期開始推出“新綠”專欄，這是面向本地青年以及在校學生的創作專欄，從作品舉隅不僅可以看到“新綠”作為本土學生新文學創作園地的角色，刊物還通過定期舉辦作家座談、徵文比賽、頒設獎項等文學活動，激發本土作者尤其是青年的創作熱情，不難看出《醒心周報》對本地文壇新生力量的重視，以及對澳門新文學發展的重要作用。此外，作者還詳細介紹發表在《醒心周報》上、進行白話文寫作實踐的三篇文章，^②又結合了本土作家陶里和時代親歷者李鵬翥對 20 世紀 30、40 年代澳門文學現場的回顧為佐證，認為《醒心周報》對澳門新文學在創作實踐和白話文理論建設方面具有雙重助推意義。的確，作者對《醒心周報》的發現，更新了以往學界對於澳門新文學發生時間點的認知。而這一時期行旅至此的南來文人在澳門的創作和相關論述頗具先行者的意味，打破了殖民地新文學園地過往的沉寂，為澳門新文學發生和發展注入了養分。

澳門科技大學趙海霞教授同樣關注到了澳門白話文學（新文學）的起點問題，從澳門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縱向梳理了以白話文學為代表的澳門新文學走過的歷程。作者首先向我們展示了晚清時期澳門地區對內地白話文運動的首次回應——陳子褒白話啟蒙讀本。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20 世紀初白話文報刊的創辦蔚然成風，全國各省幾乎都有所回應，而地處南隅的澳門也不例外。1904 年陳子褒主編的《婦孺報》、《婦孺雜誌》“為澳門白話文學的興起吹響了前哨”。^③他為了推廣白話文給婦孺，親自實踐啟蒙教育活動以涵養新人，宣導他們接受教育，並先後為其推出系列白話啟蒙教材，如《改良婦孺須知》、《三字書》、《四字書》、《五字書》、《婦孺八勸》、《女兒書》和《愛國書》等，這些教材也被廣泛用於粵港澳地區的學堂與書塾中。據介紹，陳子褒對於白話文的積極宣導還見於他在《知新報》發表的〈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一文，認為白話文的推廣有利於開民智民風，促進國家進步。整體來看，我們不能因為這一時期的澳門沒能像內地那樣完成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完全轉身而磨滅陳子褒在澳門地區為白話文推廣所做的多種積極嘗試，相反，正是因為這一聲實實在在的“在地”式獨響，打破了澳門新文學道路的沉寂，為 20 世紀 30 年代澳門新文學的正式登場奠定了基礎；隨後作者沿襲時間線索，從澳門第一首白話新詩馮秋雪的〈紙鳶〉（1920）、聞一多〈七子之歌·澳門〉（1925），以及馮秋雪、馮印雪和趙連城的新詩集《綠葉》（1928）、郁達夫的小說《過去》（1927）、白話散文

^① 李明剛：〈發生期澳門新文學再探——以《醒心周報》等新見史料為視角〉，《華文文學》（汕頭），第 4 期（2021），頁 32—42。

^② 分別是京呼平的〈寫作漫談〉、柳翌的〈寫作之路〉以及應如的〈閒話新詩〉。

^③ 趙海霞：〈轉型與新生：澳門白話文學的興起及文體變革〉，《學海》（南京），第 1 期（2022），頁 198。

〈艙中之夜〉（1933）、〈寫白鴿巢公園〉（1937）、白話劇本〈鬼子進家之結果〉（1938）到長篇白話小說《虎窟情花》（1938），由此基本勾勒出澳門新文學早期（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大致樣態；之後作者就澳門文學踏上新文學旅程作出的準備進行了三點概括：第一，作家身份從士人階層普遍下移；第二，作品的主導思想也發生了改變，由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一元思想模式發展成了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多元碰撞，作品內容也開始向現實主義靠攏；第三，新文體的全面發展，湧現了白話散文、白話詩與白話戲劇，打破了以往澳門文壇古典詩詞一枝獨秀的局面；最後，作者特別強調了抗戰時期對澳門新文學發展的重要性，1938、1941年廣州和香港相繼淪陷，這一時期澳門新文學作品的數量卻隨之大幅增長，澳門文壇新舊文學的角逐在戰火的催促中也逐漸有了定論，隨着新生代本土作家的出現，澳門也在這一特殊時期完成了從舊體到新文學的全面轉型。陳子褒白話啟蒙讀本有如澳門文學在新舊交替轉換過程中的一個橫切面，確切且真實，與作者對於澳門新文學的縱向梳理結合起來，完成了一次縱橫交錯的澳門新文學研究。

南京大學霍超群博士關注到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歷程，這是近年來有關澳門文學研究本身較為細緻齊全的梳理，所關注到的研究成果也是新鮮的，是對一直以來澳門文學研究狀況的一次有力的回應。他以普遍認同的澳門文學研究起點（1983年）為澳門文學研究史作出了四個階段的斷代，並將與之對應的發展脈絡歸結為個人經驗式的回顧、建史的嘗試與專題研究的起步、專題化研究成為主流、史料學轉向與批評觀念的調整同步開展。作者將四個階段具體情況概況如下：首先是以《澳門文學論集》（1988）為代表的預備期（1983—1988）；而接下來，陶里《澳門小說發展概略》（1996）、廖子馨《澳門散文四十年歷程——從五十年代末走到今天》（1998）、李觀鼎的〈試談澳門文學批評的特色〉（1998）、鄭煒明〈澳門中文新詩史略〉（1999）、田本相及鄭煒明等人《澳門戲劇史稿》（1999）和鄭煒明的博士論文〈澳門文學發展歷程初探〉一同建構了澳門文學在各種文體方面的發展脈絡，體現了澳門本土學者明確的“建史意識”。他們與內地學者劉登翰、饒芃子、王劍叢、費勇、陳遼、王宗法互為補充，共同為澳門文學描繪了初步樣態，由此形成了澳門文學研究的奠基期（1989—2000）；進入拓展期（2001—2010），一方面，澳門文學研究出現了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2002）、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2003）、湯梅笑《澳門敘事——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門小說的文化品格及敘事範式》（2004）、饒芃子及莫嘉麗等《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2008）、朱壽桐主編《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2010）等研究專著，他們分別在文學批評、小說、散文等新的研究專題上有進一步拓展，研究視野也非僅僅局限在文學內部。另一方面，郭濟修的碩士論文〈從飛歷奇小說看澳門土生葡人的文化特徵〉（2001）、汪春的博士論文〈論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2004）、余少君的碩士論文〈八〇年代以降澳門後現代詩研究：以葦鳴和懿靈詩為例〉（2008）以及陳少華對澳門文學中的“澳門性”的關注，雖然難掩其中的地域局限性，但也展現出這一時期澳門文學研究對既有專題的接續與深耕；進入夯實期（2011至今）的澳門文學研究最突出的就是對史料的重視，從呂志鵬《澳門

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2011）、王列耀和龍揚志《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2014）、王國強《澳門文學書目初編（1600—2014）》（2015），以及鄧駿捷對澳門第一首新詩、第一本新詩集以及第一個新詩作者群“雪社”的發現（2015），張堂錡《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2018）、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2018）、朱壽桐主持的《澳門文學編年史》（2019）、龍揚志《澳門文學期刊述要與目錄匯編》（2020），再結合歷時十年“澳門文學館叢書”的出版工程，不難發現其中“自覺的史料意識”和實證研究的突顯。^①不僅如此，作者還指出，澳門文學研究在史料建設的基礎上逐漸打開了澳門文學評價的格局，在嘗試構建文學評價體系的同時也在努力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整體架構中來。雖然澳門文學以“遲到者”的身份進入大眾視野，但這不應成為被學界忽視的藉口，反而應該“在兩岸四地多方力量的通力合作下……向歷史縱深處漫溯”。^②

三、澳門文學研究本土化圖景的構建

將 2021 年度多位學者針對書寫澳門、面向澳門的詩歌、散文、話劇等文體的研究集合起來，再結合該年度針對澳門土生文學的成果，不難發現澳門文學研究的本土化圖景在穩中有序中漸漸成形。澳門大學鄧駿捷教授以宏闊的研究視野梳理了自明代以來澳門詩詞的發展歷程，他主要將澳門詩詞創作分為三個階段，^③具體來看，第一階段是明代至清初，即“澳門詩詞的開創階段”。這一時期首先是湯顯祖對澳門的描寫，它開啟了澳門詩詞乃至澳門文學獨立自主的征程，如〈香壘逢賈胡〉對澳門的對外貿易、外商的描寫，以及〈聽香山譯者〉（二首）中對遠洋至東南亞航行、西方女性的描寫等詩作，具有起始的意義。明末清初的蒞澳土人也留下了一些有關澳門彼時情境的作品，如吳歷〈畧中雜詠〉寫澳門不同族群和澳門風光，具有特殊意義。而清初蒞澳的詩人則有兩大群體——明遺民、清廷舊官員，前者代表是屈大均，著有澳門詩十多首，其中〈澳門〉（六首）最為著名，他的詩中多有將對故國的哀思寄託於澳門風物的描寫中。後者以劉世重為代表，他的詩作〈澳門〉為後來的澳門詩創作奠定了風格基礎，而詩句“思傳六籍將夷變，令識中華禮教尊”中的“用夏變夷”也體現出作為本土人士對中華文化的自信；第二階段是清乾隆至道光，即“澳門詩詞的共生階段”，據介紹，這一階段重要的背景是澳門成為廣州府直轄的特殊地區，兩任澳門同知印光任和張汝霖合著的《澳門記略》是當時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澳門史志，標誌着澳門文學及文化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其中，印光任的“濠鏡十景”、張汝霖共有六題 22 篇描寫澳門的詩作，豐富了澳門詩的創作體量。這一階段的蒞澳詩人中商人群體因社交層面的差異，其作品所關注的對象與士人、官員大為不同，拓展了澳門詩的文學形象，

^① 霍超群：〈澳門文學研究史略（1983—2020）〉，《華文文學》（汕頭），第 1 期（2022），頁 94。

^② 霍超群：〈澳門文學研究史略（1983—2020）〉，《華文文學》（汕頭），第 1 期（2022），頁 95。

^③ 鄧駿捷：〈明清澳門詩詞論略〉，《文學研究》（南京），第 2 期（2021），頁 133—144。

應當加以關注。這一時期還逐漸形成了對澳門固定地景反覆描寫的風氣，媽閣廟、青洲島、三巴寺等地點頻繁進入詩中，如媽閣山石上就可以看到 24 首石刻詩。與此同時，澳門詞雖然進程緩慢，但也在同步發展，例如黃呈蘭的〈青玉案·澳門〉、鮑俊的〈行香子·澳門〉都可謂是箇中佳作。同時還有本土詩人湧現，以望廈趙氏族人為代表。從趙同義〈冬日蘆石塘晚眺〉和〈臘日登海覺寺〉、趙元儒〈次張太守石壁原韻〉、趙元輅文集《自警日記》及《觀我集》、趙允菁〈重修澳門望廈村普濟禪院碑記〉、〈重修媽祖閣碑記〉及《書澤堂文稿》等清晰可見，澳門本土文學的創作並非單純的“植入”；第三階段是道光至清末，即“澳門詩詞的激蕩階段”。作者指出，由於清廷軟弱，澳門被葡萄牙侵佔，人民憤恨，於是出現了以劉燾芬〈沈義士歌〉為代表的面向現實的詩歌創作，如鄭觀應〈澳門感事〉、潘飛聲〈澳門雜詩〉（其五）、丘逢甲〈哭沈烈士〉等，開啟了澳門詩詞直面社會現實，情感迸發的階段。創作形式上，逐漸形成了“澳門雜詩（詠）”組詩獨特的手法，前後有屈大均〈澳門〉六首、張汝霖〈澳門寓樓即事〉十四首、陳官〈澳門竹枝詞〉四首、鍾啟韶〈澳門雜詩十二首〉、潘飛聲〈澳門雜詩〉（十二首）、丘逢甲的《澳門雜詩》（十五首）等，是澳門詩詞創作中不可忽視的現象。澳門本土詩人創作也在這一階段有所發展，鄭觀應〈題澳門新居〉、〈澳門感事〉等，與蒞澳詩人共同構築了澳門豐富多元的文學形象。鄧駿捷教授歷時性地概括了明清時期以澳門為書寫內容的詩詞作品，打破了以往僅瞄準中國文學史為參照而作生硬地劃分——明萬曆至清中葉、清中葉至辛亥革命（1911）、民國時期（1912—1949）——的情況，其立足於澳門文學尤其是詩詞發展現狀的基礎上重新考量得出了三段式的劃分，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一向以詩詞創作見長的澳門，在新詩創作方面也有所拓展，尤其在回歸後，以開放包容的胸懷和立足本土的視角逐漸孕育出具有澳門特色的獨特風格。但是新舊詩體並駕齊驅的發展模式似乎沒有為澳門新詩得到特別的關注提供便利，因此在澳門，新詩創作或許需要通過借助各類介質完成對孤獨感的消解，例如求助網絡媒介、形成創作團體等。而核心成員為粵澳詩人的七劍詩群之創作《七劍詩選》，可謂“灣區乃至更廣闊區域內文學合作交流的成果和典範，也為澳門文學，尤其是澳門新詩創作的發展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模式”。^①七劍乃七位詩人的合稱，分別為龔剛、楊衛東、李磊、羅國勝、張小平、薛武、朱坤領，其中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澳門大學龔剛教授與廣州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李磊院長聯合主編了這部《七劍詩選》。雖然七劍並非一個在地性很強的詩人群體，但其核心成員以粵澳詩人為主，《七劍詩選》的結集出版又落地廣州，所以被認為“是灣區文學合作交流的縮影，也是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新的文學創作、交流和傳播模式的突出代表”。^②七位詩人的居住地主要分佈在澳門、廣州等五座城市，相識於網絡的他們平時

^①馮傾城、王如利：〈“灣區典範”的締造與澳門文學的發展創新——以《七劍詩選》為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第1期（2021），頁60。

^②馮傾城、王如利：〈“灣區典範”的締造與澳門文學的發展創新——以《七劍詩選》為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第1期（2021），頁61—62。

也主要通過網絡進行詩歌的交流。七劍的詩歌雖各有風格，但也有共同追尋的創作理想，開啟了信息時代跨媒介、跨地域的新詩群體創作範式。我們可以從這首花劍的〈七劍的一天〉感受到七劍筆下尋常意象中悠遠厚重的彼此情感：

剛降落，一場霧霾等着我
幸好心裏流淌着，柔劍的伊河
霜劍和問劍，據說躲在山中
現在也不知幹了甚麼
斷劍的上海，華燈初照
遠遠望去，一條流不動的河
論劍在香港逛逛，滿臉幸福
陪伴的，是霜劍的最美麗師母
沒想到靈劍也在飛機上
去紐約，明天
在美利堅，給美女們講七劍
向山姆叔描繪詩意的中國
而我還在去虹口的路上
不憂傷，也不快樂
七劍兄弟，在三大洲縱橫
天空遼闊。靈劍在美洲講哲理
論劍在購物陪老婆
柔劍在康河授課，霜劍在銀行
問劍幫女人洗碗
斷劍在談生意，打乒乓球
唯有我花劍，在漫漫車流中
等待，肚子還餓
七劍就是幾個奇怪的傢伙
見面很少，也許在人群中
還互不相識，擦肩而過
卻像哲人一樣思考
又像凡人一樣生活^①

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楊克曾在《七劍詩選》序言中表示，現代互聯網技術為詩歌帶來了更加便捷、更加多元化的通訊交流機會，也為從古遠時代一路走來的詩歌文體帶來了新的

^① 〈七劍的一天〉，新性靈主義詩城網，<http://www.xinxingling.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0&id=67>。

生機，“七劍的創作也是當代漢語寫作者的一個縮影，新詩承擔了以百年光陰實現三千年古典詩歌傳統涅槃重生的艱巨任務，沒有也不可能與傳統遺產割裂，在繼承中改造、在批古中復古，實際上延續着自春秋以來時移世易、波浪式向前發展而未曾中斷的漢語詩歌發展史”。^①

對於澳門散文創作方面的關注，既有從微觀角度進行作家作品分析的細緻觀察，又有將澳門散文放置於粵港澳大灣區進行整體觀照的宏觀論述。中山大學楊丹丹教授的〈文學史視野、在地意識和文化共同體——《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讀本·散文卷》序言（二）〉雖然不是針對澳門一地散文的有限批評視角，但是對於身處粵港澳大灣區整體框架中的澳門文學乃至散文創作，都賦予了時代新意。一如《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讀本·散文卷》的出現，讓大灣區的散文創作共同承載“回望歷史”和“凝視當下”的雙重責任。文中作者對澳門散文歷史發展進行剪影式的回顧——發軔於明代中期；在20世紀30年代隨着內地文人南下進入高速發展，湧現了一批散文家，形成了“直面人生，直面現實，直面社會，讀來有一種清新、濃郁的生活氣息”的書寫特徵，面對澳門獨特的地理空間，以散文這種形式承托“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情懷，是這一時期散文創作的普遍傾向；21世紀的澳門散文發展步入新的階段，出現了凌稜、林中英、沈尚青、夢子、穆欣欣、胡悅、丁璐、玉文、水月、谷雨、凌之等一批女性散文作家，她們的“文字不獵奇，不濫情，不炫博，也不故作高深激烈狀，無論是一顰一笑，都出自女性溫婉柔和自然秉性，感情飽滿，筆觸機巧，文字溫婉，文風秀雅，有着典麗恬淡，親切溫馨的韻致，給人一種素面勻淨、骨肉亭勻之感，女性氣質充溢其間”。^②此外，《澳門日報》的“鏡海”、“新園地”副刊為澳門文壇新秀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培養了一批以校園散文創作方式出現的學生作者，設立了“東亞校園”、“瓊林燕語”等專欄。對於這部散文集，作者從個體與城市之間建立內在的生命聯繫和精神體驗、自然生態書寫中的哲思與美學特質等方面進行評價，進入其中的澳門代表作品有林中英的〈一底年糕〉和穆欣欣的〈豆撈誤讀〉均表現了本土作者對澳門城市尋常生活徵得大眾再認識的一種追逐。此外，作者對粵港澳大灣區散文整體情況的評價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她認為，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概念，“粵港澳大灣區散文”未來會有一定的生長空間，但我們也應當正視這一較新的概念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不足，主要表現在“現階段仍然存在概念內涵與寫作實踐之間的不契合、形成地區散文流派的條件不充分、作家代際分佈不均衡、文化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意識不突出、地方知識挖掘不透徹等”的問題上，^③為包括澳門散文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散文發展指明了方向。有學者則將研究視點落在了澳門新移民作家龔剛的散文創作之上，作為內地南來澳門的作家，龔剛的跨界身份不僅局限在地域上，學者型的作家身份豐富了他的創作體裁，作詩與撰寫散文、論

^① 〈都市喧囂之上升起的性靈之月〉，《爾雅國學報》（東營），2020年2月6日。

^② 姜建：〈澳門散文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徐州），第3期（2001），頁97。

^③ 楊丹丹：〈文學史視野、在地意識和文化共同體——《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讀本·散文卷》序言（二）〉，《粵海風》（廣州），第6期（2021），頁19。

文並行不悖，完美詮釋了“他的文學世界構築在複雜的身份之上”。^①作者李昂在〈哲性與鄉愁——澳門新移民作家龔剛散文創作的藝術境界〉一文中將龔剛的散文總結為學人隨筆、懷鄉隨感和澳門書寫三種主要題材，尤其是他對於澳門的書寫展現出了新移民作家視野中的澳門特殊性。雖然這一主題在龔剛的散文作品中並沒有佔據太多的比例，但卻是外界觀察澳門文學生態中獨特性的窗口。作者認為，龔剛的澳門書寫有自身的獨特表達方式，一是“溫潤和煦、閒適自如的文風”，二是對澳門景致的“情感遷移”。^②前者比較容易理解，後者則源於龔剛的跨域經歷和雙重身份的認同，眼前的澳門景物難免投射出作家過往的經歷，一同流動在文字中，正如其代表作〈澳門的夜〉中由眼前的黑沙灘聯想到故鄉的西湖，懷鄉的情結自如地凝聚在靈動的語言上，形成了有別本土作家對澳門書寫的別樣視角，這也豐富了澳門散文的書寫體驗，體現了澳門文學的多樣生態：

在澳門生活多年，早已走遍了這個小城的山水、街巷，大炮台的滄桑，石子路的諧趣，葡人舊居的落寞，皆能引發我別樣的興味，但最能令我從塵世的煩囂中超脫出來而盡一時悠遊之樂的則是黑沙灘……當初聽說好友要來澳門，我心裏就想，大三巴這種熱鬧地段不去也就罷了，葡京賭場這種銷金之地不去也就罷了，馬介休鹹魚這種所謂異國風味不嘗也就罷了，但是黑沙灘可一定要帶他去轉轉……蘇東坡昔年賦詩感懷他在杭州作刺史的風光，說是“一半勾留是此湖”，此湖非他湖，正是豔名堪比西子的西湖……蘇東坡心中的西湖，蘇舜欽心中的滄浪亭，也正是我心中的黑沙灘了……^③

劇作研究方面，江蘇開放大學學者江萌聚焦當代澳門社會劇創作，認為當代澳門社會劇有所關注的特殊主題，但也有自身難以逾越的局限。首先從李宇樑〈怒民〉（1983）、〈逆旅〉（1987）、〈冥中行〉（1988）、鄭繼生〈來客〉（1984）、盧耀華〈斷鳶〉（1989）、李盤志〈神奇女俠也移民〉（1993）、陳雪瑩〈暗處〉（1996）、鄭桂卿的〈鏡海情〉（1996）、周和根的獨幕劇〈把根留住〉（2007）等作品可以看出，當代澳門社會很重要的主題是體現偷渡和移民問題的，充分顯示出澳門劇作家對本地社會的現實思考；其次，作者認為李宇樑的八場劇〈澳門製造〉（*Made in Macao*）（1986）開啟了澳門話劇對身份認同的思考和對本土性的追尋，隨後余潤霖〈斷雲依水〉（1996）、李宇樑〈澳門特產〉（1996）、鄭繼生〈鏡海濠情〉（1996）、青苗劇社〈從前有班細路仔〉（1994）、王智豪〈江記士多〉（2005）、曉角劇社〈聚龍通津〉（2010）等都是遵循這一路徑，抒發對澳門的“在地”情感，篤定而且深沉，不似香港話劇對認同的焦慮與迷惘。但作者也指出，澳門當代

^①李昂：〈哲性與鄉愁——澳門新移民作家龔剛散文創作的藝術境界〉，《藝術廣角》（瀋陽），第3期（2021），頁99。

^②李昂：〈哲性與鄉愁——澳門新移民作家龔剛散文創作的藝術境界〉，《藝術廣角》（瀋陽），第3期（2021），頁104—106。

^③龔剛：〈澳門的夜〉，閻純德編：《我心中的澳門》，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97。

劇作只能面對“銀紙味”蓋過“人情味”、治安惡化、教育體制等社會具體問題進行反思和批判，基本只能做“在力所能及的空間善盡職責”，而“對政治及社會根本問題抱着迴避態度”，^①對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或者諸如“族群衝突、黑幫仇殺、賭場黑幕、政治賄選”等重要問題，則表現出無能為力之感，有失社會劇本來的責任感。這一觀點鮮明而犀利地指出了當代澳門社會劇創作的現狀和局限，為澳門劇作的發展指出了方向。同時，江萌還在文章〈透過人情和人性揭示社會人生意蘊——當代澳門話劇創作思潮研究〉中詳細論述了澳門話劇對“人”的關注，^②並從四個方面介紹了澳門話劇如何對人性、人情展開自己的理解：一是通過對許國權的獨幕劇〈我係阿媽〉（1992）、李宇樑〈亞當 & 夏娃的意外〉（1993）、獨幕劇〈二月廿九〉（1993）、陳柏添的獨幕劇〈媽媽離家了〉（1995）、李宇樑的獨幕劇〈請於訊號後留下口訊〉（1997）、王智豪的六場劇〈婆婆離家去〉（1997）、李宇樑的20場劇〈紅顏未老〉（2006）和石頭公社的無場次劇〈在雨和霧之間〉（2010）等幾部劇的介紹，總結了澳門話劇對現代社會中親情、家庭倫理關係的思考；二是通過介紹李宇樑的四場劇〈男兒當自強〉（1992）、周樹利的獨幕劇〈此情可待成追憶〉（1993）、許國權的五場劇〈空白的信紙〉（1994）、莫兆忠的獨幕劇〈那一年的聖誕〉（1998）、李宇樑的多場次劇〈捕風中年〉（1998）、梁淑琪的八場劇〈連理樹〉（1996）、李宇樑的兩幕劇〈海角紅樓〉（2007）、多場次劇〈天琴傳說〉（2009）概括了澳門話劇如何通過愛情主題折射人性和人情；三是通過介紹周樹利的獨幕劇〈我的女兒〉（1976）、獨幕劇〈愛的音訊〉（1983）、李宇樑的五場劇〈等靈〉（1985）、許國權的六場劇〈九個半夢之後〉（1989）、周樹利的獨幕劇〈錶的故事〉（1990）、譚淑霞的四場劇〈灰姑娘之非常結局篇〉（1995）、莫兆忠兩幕劇〈星星男孩〉（1996）、周樹利的獨幕劇〈兩小無猜〉（1996）、李宇樑的多場次劇〈滅諦〉（2008）等劇作，將視野從家庭內部擴大到社會層面，以此觀照澳門話劇對人、人性、人情的解讀；面對過往學界對澳門話劇不同程度的誤讀，作者提出了獨到的看法，認為無論從創作主旨、戲劇審美還是劇作形式的層面來看，澳門話劇都存在鮮明的特殊性——精簡的篇幅之下慣以細節之處折射人情的光芒，於此表達對人性的洞悉。這一點，更新了以往學界對澳門話劇的認知，有助於更加客觀地瞭解澳門話劇的創作與發展。

南開大學學者胡婧關注到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認同和審美選擇問題，在參考了安娜·瑪麗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的《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Filhos da Terra*），萊薩（Almerindo Lessa）的博士論文〈澳門的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Anthropologie et Anthroposociologie de Macao”）和專著《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歷史及人類群體，澳門——一個公民島嶼的生物學及社會學特徵》（*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等研

^①江萌：〈當代澳門社會劇創作研究〉，《文學研究》（南京），第1期（2021），頁217—218。

^②江萌、胡星亮：〈透過人情和人性揭示社會人生意蘊——當代澳門話劇創作思潮研究〉，《中國文藝評論》（北京），第4期（2021），頁62—71。

究成果的基礎上，縱向簡析了 16—18 世紀直至澳門回歸前土生葡人族群大致的形成情況，剖析了同時擁有東西方血統的土生葡人複雜而又矛盾的心理，以及在文化身份認同方面的尷尬處境。由這個群體在澳門創作的文學作品，在 20 世紀前大多使用土生葡語——帕圖亞語（*Patuá*，受漢語影響，混合葡語、英語、粵語、西班牙語和馬來語），20 世紀 40 年代後多以現代葡語進行創作，因此這類作品既不能被籠統地認為是澳門的葡語文學作品，又不能簡單將其歸屬到葡萄牙文學的範疇，強烈的“在地感”和文化的多元性本身就是澳門文學的直接表達，因此作者認為“土生文學不僅是澳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澳門文化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①在澳門獨特的文學景觀中，土生文學的研究價值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以跨界親歷者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觀照文化衝突、文化交融的表現和發展過程；二是在這些作品中生動地呈現了澳門彼時真實的風貌，具有一定的歷史參考意義。作者提出，澳門土生文學大致有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時期是初步形成時期，從 17 到 19 世紀，創作語言為帕圖亞語，主要是土生歌謠和土生詩作，見刊於《大西洋國》（*Ta-Ssi-Yang-Kuo*）、《復興雜誌》（*Renascimento*）等；^②第二個時期是土生文學的繁榮時期，始於 20 世紀 40 年代，各題材不乏上乘之作，如詩歌方面有李安樂（*Leonel Alves*）的詩集《孤獨之路》；若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即阿德 *Adé*）的詩集《澳門本如斯》、《澳門詩歌》、《澳門，受祝福的花園》；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的詩集《一日中的四季》等。小說方面有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ção*）的短篇小說集《長衫》、《旗袍》；雅伊梅·多·英索（*Jaime do Inso*）的《東方之路》、《中國觀察》、《中國》；瑪麗亞·布拉嘉（*Maria Ondina Braga*）的《神州在望》、《北京的苦悶》、《澳門夜曲》、《中式晚餐》；若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的小說《瑪麗亞與歐美勒·若翰的故事》以及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大辮子的誘惑》、短篇小說集《南灣》等。散文方面有愛蒂斯·喬治·德·馬天妮（*Edith Jorge de Martini*）的散文〈廢墟中的風——我在澳門的童年〉；戲劇方面有飛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的劇本〈見總統〉、〈畢哥去西洋〉、〈西洋怪地方〉等。由此可見，澳門土生文學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是澳門文學多元生態的一個側面，駁雜的創作語言背景下映射出土生葡人文化身份認同的困惑，但也能從飛文基的劇本〈見總統〉、阿德的詩〈未來〉、李安樂的詩〈知道我是誰〉、飛歷奇的《大辮子的誘惑》中逐漸明晰了一條認同線索——從二元對立中建立“在地”的認同，一種對澳門的認同。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王旭佳 黃耀岷 陳嘉欣]

^①胡婧：〈澳門土生文學中的文化身份認同和審美選擇〉，《華文文學》（汕頭），第 4 期（2021），頁 51。

^②胡婧在文中提到在 17 世紀到 19 世紀末這段時間內，這類作品主要發表在上述兩個刊物中，但筆者查閱到《復興雜誌》在澳門的創刊時間為 1943 年 1 月，因看不到原刊物，故暫推斷原文表述有誤。詳細參見：https://macaumemory.mo/entries_0d63aabd8bb14fdd9138c11d1d2b6737。